

永川文史资料

第 一 期

(总三十期)

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组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十日

地下火燃烧在最黑暗的地方.....戴世忠

永川仙龙乡石宝寨开匪记.....贺修海

又84.57页

“大刀队”点滴谈.....夏远谋

永川何埂乡坠机事件.....陈有民

地下火燃烧在最黑暗的地方

戴世忠

1944年秋，永川县私立美井中学转来一批外地学生。他们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开学不久就贴出了壁报《儒林》。其内容庞杂，大多是宣扬古老文化，没有一点新思想，更沒有一篇抗日的文章。

当时在该校读书的王立行（原名周裕宽，现任北京日报总编）、张新柳和我看后，认为《儒林》壁报上全是尊孔读经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政的文章，必须予以驳斥。于是我们就联络了高、初中的大部份班级的壁报，联合刊出了《暴风雨》壁报。分别就《儒林》反映的保守、反动思想进行抨击。《暴风雨》四篇幅贴满高、初中部通道两侧。真是“暴风雨来了！从山那边呼啸而来，唤醒了沉睡的人们，掀起了惊涛骇浪，摧枯拉朽……”

可是，学校当局特别是训育主任张安富，军训教官何××却暴跳如雷，认为《儒林》是权威，没有一篇文章的观点可以反驳，只能钦佩、信奉。反驳了就是大逆不道，是造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是，学校当局借口说《暴风雨》上有几个误笔字或错误字，强迫予以撕毁。王力行等同学据理力争，训育主任却横蛮无理地说：不撕毁就是违抗学校命令，不开除也要记大过。我们当时仅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无斗争经验，在此高压下，《暴风雨》便夭折了。

王力行等同学非常气愤，大家商量决定，不让我们公开出壁报。好！我们就出个地下刊物，看你把我们怎么样？！那时，《新华日报》的门市部出售有一册叫《欧洲地下火》的书，报导欧洲各国民主力量反抗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斗争情况。我们就仿此书名，出刊了《英井地下火》。第一期刊载的文章有揭露学校当局收高额学费，以办学为名，行经商之实，大捞投机生意的内容，也有抨击军训制度、训导制度和伪善教员不堪为人师表的丑恶行径的内容。这些文章言词尖锐，语言泼辣，嬉怒谑讽，极富战斗力。在刊出那天晚自习后，《英井地下火》就分发到每个同学的书桌内。第二天同学们读后，除了少数三青团学生外，无不喜悦称快。因它代表同学们出了被压抑多年的怨气。学校当局发现后，怒气冲冲，立即搜查，勒令同学们交出，予以销毁。

紧接着，第二期第三期又出刊了。这两期的内容，除与第一期大体相同外，还有利用英井中学董事会的矛盾的文章赞同朱明仙、方伯超这二位英井中学的创办人出来继续办学，反对何维伯主持校务。散发的范围已扩展到社会上，还写了几十张标语，贴在校内要道如大十字、小十字、大南门、小南门。“地下火燃烧在最黑暗的地方，它给人们光明、温暖和力量……”。英井中学当局见此情形，气得咬牙切齿。训育主任找王力行、张新柳等几个“危险分子”轮流训斥，恐吓，要他们坦白认罪，争取不开除，从轻发落。《暴风雨》的主要成员，

≈ 2 ≈

表现很坚强，一致矢口否认《英井地下火》是他们干的。

英井中学当局在惊恐之余，耍出了毒辣的一招——秘密向国民党永川县党部、三青团永川分团、重庆卫戍部永川稽查处报告，说英井中学出了异党分子，并抛出黑名单，要他们插手缉拿。不两天，永川三青团总干事张洪昭，组织干事曾宪宇，永川稽查处主任张国忠，稽查员万英等接二连三地找王立行、张新柳等几位同学谈话。先是恐吓，说王力行、张新柳是共产党，限定在24小时内离境。并又说，若不是共产党，为何订阅《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为何组织“互助读书会”，扩散《新华日报》的言论？王、张二同学只作了简要而有力的反驳说，《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是公开发行的报刊，我们是好奇地订阅的，“互助读书会”是同学们研究讨论学问的校内组织，无社会活动；扩散《新华日报》上的言论是否有证据？并一致否认《英井地下火》是他们干的，自己也不是共产党。这些党棍、特务抓不住证据，也就没有立即下毒手。

他们被审询后，怕敌人下毒手，便通知有关的主要成员戴世忠、潘汝积、潘汝光、唐义忠、吕林宣等暂时离开永川县城，到乡下分散隐蔽起来。张新柳、潘汝积等三人，为陪伴佛教笃信者唐吴太清到江津油溪龙华寺烧香还愿，借此躲避缉拿。

十余日后，经过亲友多方疏通，家长出面担保，永川稽查处、三青团永川分团答应不抓人，可暂时回校规规矩矩地上课。但在这学期

结束时，学校竟开除了王立行的学籍，戴世忠、吕林宣却以旷课过多为借口而被黜退了；张新柳被拉入三青团在英井中学办理组织手续并于本期毕业离校；其余如潘汝积等亦以参加三青团了事。

私立永川英井中学的这一民主学生运动的星星之火，只暂时遭到挫折，并未遭到完全扑灭，他们以另一斗争手段，继续开展了活动……

△ 永川仙龙乡石宝寨开匪记

贺 修 海

永川县解放初期（1949年底至1950年初），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四乡偷盗、抢劫、行凶杀人案时有发生。土匪尤为猖獗，闹得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仙龙乡附近的匪首罗万才（任匪部中队长，率匪徒三百余人，屏白升云土匪系统），在1949年底先后抢劫本乡的弯头和赵家屋基等处，次年正月初又抢劫石宝寨，把整个寨内人家洗劫一空，人们无不痛恨。

石宝寨被劫后，本（张家）区公所曾派妇女主任蒋三嫂到石宝寨调查。当蒋还未到寨子时，就远远看见寨墙上有人背起枪在走动；她以为是土匪，就连忙返区汇报，说石宝寨土匪多得很。其实，当时蒋三嫂看到寨墙上背枪的是寨丁和护寨的绅粮子弟。区里得到蒋的汇报后，马上通知本地驻军一〇三团所属部队派兵到石宝寨清剿。

1950年旧历二月初十，土匪罗万才随带匪徒七、八人从石宝寨前面的大路经过，却又被寨内的大地主潘克修（曾任伪仙龙乡长），彭万相等发现，派人请入寨里，在马少轩家共同商议防守寨子问题。因为前几天潘就听人传说，解放军明（二月十一日）天要到石宝寨来。潘猜不透解放军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当时人民政府的很多政策在他心里都有顾虑，唯恐解放军来对他不利，总是放心不下。为了

利用罗的力量来保住自己和石宝器这个封建堡垒。便百般殷勤地招待他，要求他帮助守好寨子，不让解放军进去。当时的大地主和匪首们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彼此都有共同的命运和利害关系，所以罗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帮同防守。开明人士庞洲谋知道这个情况，就约集几个青年前往马少轩家，向罗、潘建议：“罗三哥（袍哥语言称呼罗）帮同守寨，原是为了全寨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可是老八（土匪称解放军）一旦来寨搜索，势必两军交锋，而覆巢之下民众何安全之有！依我等之见，三哥不如退出寨外，万一老八来寨，再率你的队伍前来救援，化被动为主动，使寨民免遭涂炭，岂不两全其美吗？”罗万才说：“庞三哥，我素知你是胆小的人，我那队伍前几次在六王庙、火石坎等地作战，哪一次不把老八打得落花流水，请你不用顾虑！”庞洲谋见罗万才夸吹自负，毫无商榷之意，即与同行青年辞出。当天晚上，潘、罗遂召集寨内的人开会，征求大家守寨意见，表面看来还很民主，实际上潘、罗和少数人已经决定好了。开会的时候，唯恐有些人不好发言，就给每人发张纸条，同意守寨，不让解放军进去的，就在纸条上写个“同”字；不同意守寨，又愿意解放军进去的，就在纸条上写个“不”字。可是，在匪首罗万才的手枪威迫下，谁还敢写个“不”字呢？开会结果，所有纸条上都是“同”字，当然，这样便算通过了决议，共同防守寨子了。

第二天的天气很好，太阳刚一出来，身上就觉得暖洋洋的。寨子

~ 6 ~

里的人把寨门关上，还在寨门后面搬来几块米多长的大石头把门抵得紧紧实实的。匪首罗万才一方面打发他的小老么（比他年轻的土匪）回到他的驻扎地大磨乡属新顶弯，范坪一带调他的队伍到石宝寨来增援；一方面命令自己带来的几个匪徒和寨丁以及部份绅粮子弟爬上寨墙上作好战斗准备。他自己和潘克修就在寨墙上巡迴指挥、监视。

他们刚吃过早饭，突然看见寨子外面有人纷纷向四处逃跑，一问才知道解放军真的快要来了，人们惧怕解放军和土匪打起来自己遭受损伤，所以就离开寨子躲起来。一会儿解放军从仙龙方向开来了。他们一见寨门关着，就在门前的坡坎下隐蔽起来。过了一会，从吉安、大磨、张家方向也继续开来了不少的解放军。他们都在寨外选择适当的地方隐蔽起来，把寨子团团围住。寨门口的解放军开始向寨上喊话，“我们是解放军，请你们把寨门打开，我们要进来。”寨上的人回答，“我们不能开门，是为了怕土匪抢寨子，因为前次土匪来抢过一次了。你们要什么？我们给你们送出来。”解放军又喊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是来清查土匪的，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是为人民除害的，请你们把门打开。”这样反复喊了几遍，仍不见开门。这时罗匪提起手枪凶猛地吼道：“谁开寨门，就枪毙谁！”最初，罗匪认为石宝寨地形险要，四面都是高坡陡坎，易守难攻，纵然和解放军打起来，自己还有队伍增援，同时他估计仙龙所驻的解放军不多，只不过一、二十人，很容易对付，所以当潘要求他协同守寨时，他就毅然地答应包下来。

现在他的心情有些紧张，做梦也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解放军从四面开来围住寨子。他更没想到自己派出去调部队的小老么竟一去不返了。原因是小老么离寨不远，刚看见解放群从几条路向石宝寨开来；解放军多，自己人少，寡不敌众，即使调来全部匪中队人马，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就干脆溜之大吉，再不转来了。罗匪还蒙在鼓里。

寨门前的解放军战士敲门无效，看见寨门侧堆有两捆干柴，就将它投来靠倚寨门烧起来。由于门板用铁皮钉封了的，短时不易烧坏。寨上地主邓清才看见情况紧急，忙将装好火药的土炮（即抬杆枪）引发射击。烧门战士随即退下还击。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展开了，只听双方的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石宝寨几面都是很高的土坎，坡度很大，周围又无什么障碍物可作掩护，解放军不易靠近寨墙，只有小山门外一线坝子比较平坦，就选定这个地方为进攻的突破点。于是在离寨墙两百多米处安置迫击炮，稍近一点架好轻、重机枪。战士们集中火力向小山门右侧寨墙的上部份（下部份是一丈多高的石头墙基）猛烈轰击，迫击炮弹一枚接一枚地在寨墙上爆炸，步枪、机枪、冲锋枪也响个不停，打得寨墙上的土匪几乎乱了套。从上午十点打到十二点枪声甚密，十二点后才稍微稀疏，到下午一点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比上午更为猛烈。本来进入寨子的土匪就不多，虽有少数绅粮子弟和守寨寨丁参与，但他们哪里见过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而且既未经过严格训练，武器弹药又差，怎么经得起这样猛烈火力的轰击！

到五点左右，小山门右侧寨墙被轰出一条缺口，解放军即与机枪掩护战士冲锋。战士们抬起准备好的云梯象猛虎般地扑向墙顶，将云梯搭在缺口上奋不顾身地往上爬。土匪见战士爬上墙，有的用长竿放云梯，有的伏着身子用枪射击。在这一刹那的争夺战中，双方打得尤为激烈，匪首罗万才、大地主潘克修相继受伤。转眼间，云梯顶头一个战士被打下来了，下一个又马上接上去。他们还不停地向缺口里掷手榴弹。云梯上又接二连三地打下几名战士。他们毫无惧色，仍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解放永川，不惜任何牺牲，前仆后继，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终于登上了寨墙。土匪们见势不可挡，回头就跑；战士们分头追击，并高喊：“缴枪不杀！”反动地主邓德柱、土匪冯某某坚持反动立场，边打边退。抗不缴枪，在追击中先后被击毙。这时夜幕降临，其它几面的战士也很快进入了寨子，立刻进行全面搜索。匪首罗万才、反动大地主潘克修在受伤后隐蔽在阴沟里，拒不投降，被搜索部队击毙。

搜索完毕，计搜出可疑分子数十名。由地下党员马树林（于作战前潜伏在汪家楼房内）来辨认。凡本寨善良民众，都当即放了，只是部份嫌疑分子被扣押下来。另外有老百姓罗万石（地主的炊事员）、陈香廷（木匠）、邓哑巴（女）、樊世泉（青年）等当解放军打进寨子的时候，他们由于心里畏惧，有的跳下墙想逃走，因天黑看不十分清楚，被寨外担任警戒的战士误认为土匪被击毙，有的是在搜索当中

乱跑被乱枪打死。

在这次战斗中，解放军战士共牺牲十八（受伤人数不详）。当即用花木安葬于石宝寨大门前面。第二天早饭后，解放军押着被扣留的嫌疑分子，抬着伤员分头向太平寨（喻尔拔）和其它方向开去。

“大刀队”点滴谈

夏 远 谋

一九四九年冬，永川城刚解放不久，全城老百姓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解放军和各机关团体及各学校师生都组织有秧歌队、腰鼓队，穿红着绿，载歌载舞，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群众无不喜在心头，笑在脸上。欢欣鼓舞地各安生理。可是，反革命就不愿让群众过安生日子，刚建新军不久的红色政权各方面还未安排就绪之际，意图乘机扰乱，使人民处于初生之中。城里经常造谣风闻“大刀队要来劫城”。人们本来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几个人一跑，叫声“大刀队来啦”，于是满街的人都不自觉地惊慌失措，一窝蜂似地乱跑，大呼小叫不知往哪里躲才好。有时跑着跑着见前方的人迎面跑来，急忙回头又跑，弄得前后的人互相挤撞，摔倒很多人。这种情况，有时一日数惊，真是不堪其扰。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那种滋味的。人们传说，大刀队是喝了什么符水以后，刀枪不入，机关枪都不怕的神兵。他们手提大刀，凶神恶煞，逢人便砍，真是骇人听闻。当然，有些智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

腊月二十九日那天，是旧历年的“除夕日”。正逢赶场。凌晨，有的商店已下了门板准备营业。突然西门外枪声大作，密如沙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刀队来了！”开了门的人吓得门都不关，四处乱

跑乱躲，哪还顾得商店的东西哟！

一队解放军持枪向西门跑去。不一会，见一个头部负伤满身鲜血的解放军跑了回来。这时枪声更紧了，并且越响越近，好象猛火煮稀饭似地，简直分不出点予来。我住在小什字街电灯公司门市部，幸好还未开门。我们死死把门抵上，过了许久，枪声稀了，终于停了，大刀队被打退了。

午后，人们到打过仗的地方去观看，有几个解放军竟死在大刀队的六刀之下。人们不胜哀悼和崇敬这些为保卫人民的安全而贡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亲人——解放军。

在张家坡马路边有两个被机枪打死的大刀队员，腰杆被打烂大半边。人们用脚踢了一下尸体，并骂道：“该死的東西！你以为真刀枪不入呢？……”

第二天所有被打死的二十多个大刀队员都集中新桥河坝示众。我见其中一人是王治陶，因为解放后就来见面，突然在大刀队尸体中发现，不能不惊讶啊！“原来是他！”不免联想起他已往的行为之所以那么诡秘，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王治陶又名王祖陶，四十多岁，瘦高个子。听说他在军阀罗广文部队当过营长，住在小南门城墙边（现联芳饭店背后）。我因他妻子代华章的关系而认识。此人性情孤僻，崇尚迷信，社会上交往不多，开一家冷酒店。每天早晚躲在楼上焚香顶礼敬神。楼上不准任何人

去，他妻子也不例外。因此不知他究竟搞什么名堂，拜什么神。我出于好奇，曾设法试图探其究竟。他总是百般回避，不露一言，只说信佛而已。

王治国传出一种迷信活动叫“碟仙小姐指迷津”。其作法是，桌上摆一张很大图纸。图纸上由大到小画若干圆圈。依图画很多方格。每个方格内写有象征吉凶祸福的字，如：“婚姻美满”、“谋事不成”、“病势流连”……等。用一个小碟子仆在图纸上。小碟上放一枝筷子。王说：“碟仙小姐是九天玄女娘娘的侍女，神通广大，能断吉凶祸福，指示迷津，遇难呈祥。凡要问休咎的人，只需虔诚念咒，用食指轻轻按在筷子上，碟子自然慢慢移动。需要问什么，待碟子不动了，筷子指着哪方格内的字就是需要问的吉凶，无不应验”。我本来就不信鬼、神、指、命之说，见此，仅一笑置之而已。因此，并未去过问咒语是怎么念的。这事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了，在当时还居然麻痹了不少的人哩！笔者那时还年青幼稚，从未来思考过他这些活动的深意。当发现他的尸体时，才知道他是“大刀队”的。对他以往的活动不能不产生惊惧。他的行为无疑是在为“大刀队”干着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

记永川何埂乡坠机事件

陈 有 民

一九四四年四月的一天，一架国民党轰炸机（代运输机用），从兰州飞向重庆。因机上罗盘受磁差影响，航线电讯又遭中断，遂半途迷航。时值薄暮黄昏，夜色弥漫。当飞机飞临何埂乡上空时，发现吴家坝白茫茫一片空旷地段。（实际是一片稻田）驾驶员便决定选择此地“强迫着陆”。飞机下滑，着陆轮落地后随着惯性在稻田泥、水中颠簸向前冲驶，受到田埂土台等阻碍，将飞机左翼折断，机头受损，油箱汽油泄满田中，驾驶员也受了伤。

之前何埂乡乡长吴文勋之弟吴太斌，在空军轰炸大队执勤，曾借驾机出差之便，常向家中空投什物。此次飞机黑夜降落，人们疑是吴太斌又回来了。吴文勋率乡公所壮丁，手执灯笼火把，直奔吴家坝。沿途高呼：“太斌回来了！太斌回来了！……太斌……太斌……”。群众闻讯也纷纷举火前往观看。驾驶员已解开保险带，爬出座舱，离开了残破不堪的飞机。就在这吋浮于田中水面上的汽油被火把引燃，浓烟顿起，火苗伸向四方，稻田成了一片火海。飞机随即着火，机上的机枪子弹爆得叮哩咣啦，经久不息。

第二天，何埂乡公所将驾驶员及三挺机枪送来松溉（我那时任松溉副镇长）住塘湾街旅店休息。见他头部已经包扎，鲜血仍不时从左

眼角渗出，右腿骨折，起步艰难，精神十分萎靡，垂头丧气地只简单谈着陆经过，最后说：“我姓唐，航校八期（指昆明航校）……从兰州……飞重庆。”当晚，便乘“长虹”汽轮东下去了重庆。

不久，重庆“航空委员会”责令“永川县政府”转饬何埂、松溉两乡镇：“务将飞机残骸运渝”。天啊！庞大的飞机，既无专人拆卸，又无公路可通，田间小道，如何起运？不得已，两乡镇各自召集各保壮丁，分段负责。除将一些零星部件，扛的扛，抬的抬以外，主体机身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象蚂蚁搬家，“浩浩荡荡”地运至松溉河边，再由木船运交重庆“航空委员会”。一场劳民伤财，轰动一时的坠机事件，方告结束。